

中共八大与七千人大会比较研究

王广峰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 中共八大和七千人大会都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民主发展的两座高峰。两次大会在会前准备、会议进程、会上发扬民主方面都出现相似的情形,会议都通过了符合实际的经济建设方针,都由于会后党内民主的缺失,导致政策没有贯彻实施下去,“左”倾错误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正反两面的事实证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八大; 七千人大会;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71;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36(2013)02-0006-05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1]470}中共八大和七千人大会虽然相隔了六年,但在很多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

一、大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1. 会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中共中央对八大的各项工作进行了精心筹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思想,为大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的准备。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2]86}。关于预备会议的任务,邓小平指出“第一,在十三天内政治报告、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五个文件要定稿。第二,在十二三天内力求在预备会议期间把选举的大部分工作做了。基本的候选名单要在这一十二三天内得到一个初步的结果。第三,发言稿也要在十二三天内全部准备好。要求划分几个综合组平行作业,研究文件问题:一个是关于政治报告组,一个是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组,一个是关于五年计划建议和关于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组。总之,9月7日以前必须把这些意见提出,然后才有修改的时间,否则就来不及了。”^{[3]126}参加预备会议的代表讨论并修改了大会报告和各项文件,会议始终充分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集体智慧。

七千人大会召开前,为了扭转三年困难的局面,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而党内思想状况却不能适应这种形势:不少干部对困难仍估计不足,对自己铺开的摊子舍不得收缩,对调整的决心不大;还有相当多的人对近两年国内出现的困难形势产生消极的埋怨情绪。许多人思想上存在各种疑问,希望中央能够开个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统一思想,更好地完成1962年的任务。于是中共中央在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

[收稿日期] 2013-03-14 **[修订日期]** 2013-03-19

[作者简介] 王广峰(1985—),男,山东枣庄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1962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及长远计划、党的工作等问题,强调1962年是贯彻调整八字方针的关键一年。9日,会议分组讨论了为刘少奇准备的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第一稿,周恩来提出1962年进行全面调整的八项任务,加强了调整工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准备,10日会议结束,11日七千人大会开幕。

2. 会议的进程相同。以往开会是先作报告,后讨论;而八大和七千人大会是先讨论,后作报告,自下而上地发扬党内民主。八大召开前举行了预备会议,会议代表对中央委员会准备提交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进行详细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据参加八大的福建代表伍洪详回忆:八大继承了七大的传统,在高度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达到高度民主。这次会议跟以往历次会议的开法有所不同,以往开会总是先报告后讨论,而八大是先讨论后报告,等报告人正式作报告时,问题都已经讨论好了。所以预备会议开得很紧张,既要讨论文件,又要酝酿选举,还要准备发言。会议采取“平行作业”的方法几个工作同时穿插进行^{[4]52-53}。

七千人大会前夕,中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起草大会报告。但由于起草报告的时间太长,毛泽东在1月8日和9日晨才收到报告第一稿,11日大会就要举行,下午刘少奇要代表中央作大会报告。毛泽东9日23时才收到报告第二稿,而且还缺第三部分。这时,距开会的时间只有一天,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显然是太紧张了。因此毛泽东决定刘少奇推迟三天作报告,大会先讨论农村基本核算问题单位问题和由周恩来报告苏共二十二大的问题^{[5]5}。但是毛泽东很快又改变了计划,把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召来他的住处说,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也不看了,整个报告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5]16-17}。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报告稿连夜印发出来,11日及时发放到参加大会的同志手中,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代表11日阅读文件,12日起分组进行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代表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13日上午,毛泽东又提出一个建议:延长会议时间,以小组讨论为主,对报告进行充分的讨论;报告经大会讨论定稿后,直接发给大会,少奇同志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报告稿,只是对报告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6]49}。大会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在大会讨论的同时,由刘少奇组织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历时八天,第二稿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印发与会者,刘少奇直到27日才作报告。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5]17}

3. 会上畅所欲言。八大和七千人大会都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典范。从会议的进程看,八大民主的会风体现为大会高度的开放性和政治透明度,会议上代表发言人数多,代表面广,发言内容丰富具体。据统计:整个会议期间,有68人在大会上发言,45人做了书面发言。另外,还有70人已经准备了发言稿,但因故未在大会上发言,也没有在报上作为书面发言刊登,其中已经定稿的62篇,尚未定稿的8篇。这70篇未发言亦未刊登的稿子,包括张闻天、徐向前、贺龙、聂荣臻、叶剑英、陆定一、谭震林等的发言稿^{[3]238}。再从大会的选举看,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是代表们充分行使民主权利、高度发扬民主的过程。关于大会的选举,毛泽东在1956年8月22日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讲“先由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合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长、副团长制定一个预选名单,然后再发下去,各代表团进行预选,然后再由政治局集合起来,制定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候选名单。”^{[3]124}邓小平说“选举工作是这次大会很重要的一件工作,原则是先提一个名单,先由下而上,然后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最后才提出正式候选名单。”^{[3]124}在选举问题上的合理、公平,体现出党的成熟和自信。

七千人大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正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大会原本计划1月30日结束,但毛泽东提出延长会期,开一个“出气会”。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6]153}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不少人把心中的怨气发泄出来了,有给省委提意见的,也有给地委提意见的;有提工作中的意见,也有提运动中的意见,还有提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意见等等,有些意见则讲得相当尖锐。

在承担责任的问题上,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7]121}毛泽东讲话后,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各中央局书记、省、地、县委书记纷纷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人人进行自我批评,人人承担责任,这对解除全党的疑虑,增强党的凝聚力起了重要作用。从出气到自我批评,使七千人大会实现了克服分歧、上下同心的既定目标。1992年7月下旬,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稿时,再一次回忆起七千人大会,他说“在那次会议上,大家都做了检讨嘛!总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民主,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怀,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8]1029}

二、会议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

两次大会召开前夕,领导层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都存在分歧。八大前的分歧主要是经济建设方针;七千人大会前夕的分歧主要是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稳的冒进势头,中央领导人对此产生分歧: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已经加快了,经济建设的速度也要加快;周恩来、陈云等要求生产平衡、物质平衡和财政平衡。这场分歧集中体现为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之争上。

1955年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召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毛泽东敏锐的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决定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9]487}并批判农业部长邓子恢。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后,国务院各部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冒进的形势更加严峻。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实际的工作中则力主反冒进,195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认为预算报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这就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出的结论”^{[10]537}。虽然看法不同,代表们在会议上仍旧畅所欲言,最后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说明,反冒进在党内得到了大多数领导人的认同。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1]805}。尽管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赞成的,但此时他服从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意见,说明这时党内的民主生活是正常的。正如毛泽东所讲“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7]119}薄一波指出: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史册的^{[10]561}。

七千人大会前领导人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困难形势估计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

人,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对困难形势有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7]89}而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依然是好的,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说“国内形势总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了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12]10}在“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华东局的柯庆施同志1月17日发言,对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表示不满,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15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8]1022}而实际上,七千人大会后的西楼会议上发现当年预算中有30亿财政赤字,经济形势比七千人大会时估计的还要严峻。刘少奇在西楼会议上坦率地说“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13]他认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尽管存在分歧,大会还是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从1961年到1966年的发展可以看出,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14]296}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完成,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1]808}。

三、会后党内民主的缺失导致路线的中断

遗憾的是,两次大会制定的政策没有执行下去。八大结束不久,党就发动了整风运动,随后转入反右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的过于严重,反右斗争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现象,毛泽东修改了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认为阶级矛盾仍旧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指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4]294-295}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把反右斗争与反冒进结合起来,他多次在中央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一反冒进就泄了气,六亿人民泄了气不得了^[15]。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去年一年扫掉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一个是农业发展纲要,一个是促进委员会。”^{[16]544}随后,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8]637}接着在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陈云、李先念等都作了自我批评。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接着反反冒进,他指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8]640}。毛泽东进一步归纳: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8]640}。这场半年多的批评反冒进中,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在冒进的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薄一波指出“大跃进那几年里,强迫命令、瞎指挥成风,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人民群众中,民主生活都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党员和群众,都没有发言权,更不能说不同的、反对的意见,以致酿成了大的错误,并且得不到及时纠正。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8]1032}

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邓小平指出“看起来,这时候毛泽

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的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14]296}虽然毛泽东提出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而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但在调整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把不同的意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分析批判。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对于刘少奇等人对困难形势的估计,毛泽东称其为“黑暗风”;为了克服农村严重的困难,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赞同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被毛泽东称为“单干风”;把彭德怀平反的要求称为“翻案风”。自1959年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入党内,并引向党内高层,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7]122-123}这就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而后,毛泽东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四清”运动,直到“文革”爆发。

总而言之,中共两次大会的历程充分证明,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线。发展党内民主,首先要保障党员权利。党员是党内民主的主体,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与监督权,进而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全党的意志和力量,如此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即使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得到纠正。而当党内民主受到破坏,党员的民主权利被侵犯,党就会走弯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其次,“必须把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4]146}。

关键是把民主集中制度真正贯彻落实,在党内生活中既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又要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关系和矛盾,进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杨胜群,陈晋.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
-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6]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1]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2]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13]杨明伟.七千人大会前后党对形势认识的反复[J].党的文献,1997(5).
-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5]李锐.“大跃进”失败的教训何在(下)[J].同舟共进,1997(8).
- [16]郑德荣,郭彬蔚.中共党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 [17]樊安群.论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表态和检讨的重大作用——兼论周恩来与林彪表态之异同[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责任编辑:朱飞]